

文学丛刊

第一輯



文學叢刊

第一輯



文學叢刊

第一輯 目錄

質問「文藝報」編者	袁水拍 (三)
走什麼樣的路	李希凡 (七)
在朝鮮的日子 (小說)	馬加 (五)
吸引 (小說)	謝挺宇 (八)
兄弟倆 (小說)	吳夢起 (二六)
家鄉傳說 (詩)	胡昭 (三三)
建設新保安屯 (詩)	申蔚 (三八)
歸來 (詩)	楊允謙 (三九)
記全蘇農業展覽會 (散記)	金肇野 (三一)
送走的信 (劇本)	柯夫 (一五)
論中國原始文學 (論文)	楊公驥 (四〇)
內容提要	(九二)
封面木刻	朱鳴岡

質問「文藝報」編者

袁水拍

中國作家協會最近開了一個會，討論關於「紅樓夢」研究的問題（見十月二十六日本報新聞）。會議反映出，文藝界已經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這種現象還是最近才出現的。長時期以來，我們的文藝界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曾經表現了容忍麻木的態度，任其佔據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統治地位而沒有給以些微沖撞；而當着文藝界以外的人首先發難，提出批駁以後，文藝界中就有人出來對於「權威學者」的資產階級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對於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擺出老爺態度。難道這是可以容忍的嗎？

「文藝報」在轉載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時所加的編者按語，就流露了這種態度。按語說：

這篇文章原來發表在山東大學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着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徵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轉載在這裏，希望引起大家討論，使我們對「紅樓夢」這部偉大傑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確的了解。

在轉載時，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錯字和由編者改動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來的意見。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有大家來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而且不僅關於「紅樓夢」，同時也關於我國一切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

編者加了按語，大概是為了引起讀者對於這個討論的注意。但是可怪的是編者說了這樣一大堆話，却沒有提到這個討論的實質，即反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唯心論觀點，反對文藝界對於這種唯

心論觀點的容忍依從甚至讚揚歌頌。

我們有沒有理由說文藝界原來存在着對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唯心論具有容忍依從甚至讚揚歌頌的態度呢？

「文藝報」就是一個具體例證。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九號有一則向讀者推薦俞平伯著「紅樓夢研究」的評介文字。其中說：「這本書的前身是三十年前曾出版過的『紅樓夢辨』，著者根據三十年來新發現的材料重新訂正補充，改成現在的書名，重新出版。……過去所有紅學家都戴了有色眼鏡，做了許多索隱，全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其他有價值的考證和研究也還有不少。」

「紅樓夢研究」一書固如李希凡、藍翎「評『紅樓夢研究』」一文中所指出，也有它的正確的和有用的部分，可是它的根本的思想，作者俞平伯的錯誤的文藝思想，却一點也沒有在「文藝報」的這篇評介中被指出。這不是容忍依從嗎？

附在「紅樓夢研究」本文後面文懷沙的跋文對這本書備加讚揚，並捎帶一鎗，針對「五四」以來革命文藝譏誚了一通，「文藝報」的這篇評介對這也不加理會，却一再地稱讚這本書。跋文認為作者已「獲得相當良好的成績」，「文藝報」更進一步說成是「很大的功績」。這不是讚揚歌頌嗎？

既然過去的評介曾經是那樣，就難怪現在的按語是這樣的了。

但是這個按語尤其可怪的是它對待青年作者的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態度。

我們有理由向「文藝報」的編者要求公平地待遇它所刊登的文章。然而，我們就以今年已經出版的十九期「文藝報」來看，其中發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編者加了按語的只有十三篇，在這十三條按語中，有十二條都只有支持或稱讚的話；獨獨在轉載李希凡、藍翎兩人所寫的這一篇文章的時候，編者却趕緊向讀者表明「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於究竟有哪些缺點，編者並沒有指出，不過是「顯然」存在罷了。

待遇不公平，是什麼緣故呢？也許按語中已經給我們點明：「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

學的青年」，他們雖則寫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文章，也只能算是「試着從科學的觀點」云云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十月十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副刊登載李、藍兩人「評『紅樓夢研究』」一文時也加了類似的按語，那一個「編者按」說：「目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去研究古典文學，這一極其重要的工作尚沒有很好的進行，而且也急待展開。本文在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同時我們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請看吧：「文藝報」和「文學遺產」對於任何其他作者的文章都不聲明是「開始研究……」的「青年」「試着」「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都不聲明是只「供我們參考的」，惟有對這兩篇文章就如此特別對待，這究竟是什麼動機呢？難道「文藝報」和「文學遺產」的其他作者一律都是充分研究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老年嗎？難道它們所發表的其他文章一律都不是「試圖」或「供我們參考」，而一律都是不能討論的末日的判決嗎？

對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揚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一概加以點頭，並認為「應毋庸疑」；對無名的人、青年，因為他們宣揚了馬克思主義，於是編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將其價值儘量貶低。我們只能說，這「在基本上」是一種資產階級貴族老爺式的態度。

這種老爺態度在「文藝報」編輯部並不是第一次表現。在不久以前，全國廣大讀者羣衆熱烈歡迎一個新作家李準寫的一篇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及其改編而成的戲劇，對各地展開的國家總路綫的宣傳起了積極作用，可是「文藝報」却對這個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評，並反對推薦這篇小說的報刊對這個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藝界和羣衆的不滿。「文藝報」雖則後來登出了糾正自己錯誤的文章，並承認應該「對於正在陸續出現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較長期地在羣衆的實際生活中、相當熟悉羣衆生活並能提出生活中的新問題的新作者，……給以應有的熱烈的歡迎和支持」，而且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很好的教訓」；可是說這些話以後沒有多久，「文藝報」對於「能提出新問題」的「新作者」李希凡、藍翎，又一次地表示了決不是「熱烈的歡迎和支持」的態度。「文藝報」在這裏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系，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却疏遠得很，這

難道不是顯然的嗎？

應該指出，這決不單是「文藝報」的問題，許多報刊、機關有喜歡「大名氣」、忽視「小人物」、不依靠羣衆、看輕新生力量的錯誤作風。文化界、文藝界對新作家的培養、鼓勵不夠，少數刊物和批評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權威」，不能被批評，好像他們永遠是「正確」的，而許多正確的新鮮的思想、力量，則受到各種各樣的阻攔和壓制，冒不出頭；萬一冒出頭來，也必挨打、受到這個不夠那個不夠的老爺式的挑剔。

資產階級的「名位觀念」、「身份主義」、「權威迷信」、「賣老資格」等等腐朽觀念在這裏作怪。

他們的任務似乎不是怎樣千方百計地吸引新的力量來壯大、更新自己的隊伍，反而是橫躺在路上，擋住新生力量的前進。

文藝界的很多人曾經讀過斯大林的給費里克斯·康同志的信，斯大林在信中這樣說：「我毫不後悔我給文學界一個無名的人的不足道的小冊子寫了一篇序言，……我堅決反對只給文學『顯貴』、文學『名人』、『巨匠』等等的小冊子和書寫序言。我認為，我們現在應當拋棄那種對本來已經提拔起來了的文學『顯貴』再加以提拔的貴族習慣，由於這些『顯貴』的『偉大』，我們的年輕的、沒沒無聞的和被大家所忘記的文學力量正處於不斷呻吟之中。」

這封信又說：「我國有成百成千有能力的青年人，他們用盡全力要從下面衝到上面來，以便向我們建設工作的總的寶藏貢獻自己的一點兒東西。然而他們的努力總是白費，因為他們常常被文學『名人』的自傲、我們某些機關的官僚主義和冷酷無情、同輩男女的羨妬心（它還沒有轉變成競賽）壓下去了。我們的任務之一就在於打破這堵銅牆鐵壁，給不可勝數的年輕力量以出路。」

讓我們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從這裏吸取教訓吧！

走什麼樣的路？

李希凡
藍翎

——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

近幾年來，人民出版社機關大量整理和出版了中國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研究古典文學的著作也逐漸出現了。在這些著作的序文中，許多作者都表示出一個共同的希望，企圖通過自己的著作幫助廣大讀者更好地認識古典作品。這種願望是誠懇的，是值得歡迎的。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究竟是怎樣研究了這些古典作品。只要我們認真地翻閱一下有關的書刊雜誌，將不難發現，真正地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去全面地分析和批評一個作家的思想或一部作品的內容的著作却是微乎其微的，而大量的關於作者身世和作品細節的考證却是連篇累牘。有時人們真會懷疑，難道「國故」大家們的「考據」時代又借屍還魂了嗎？當然，我們並不抹煞考證工作的重要性。在今後對古典文學的研究中，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進行考證和校勘工作，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問題也就發生在觀點和方法上面。

有很多研究著作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件時髦的外衣，骨子裏仍然販賣着舊貨色，不觸及作品的實際內容，割裂作品中的藝術形象，通過極其隱蔽的方式，抹煞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的社會作用，向廣大青年羣衆傳播有毒的東西。這實質上是三十年前曾經發生過的一次資產階級反動思潮的再現。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反映。一切舊有的反動的思想觀點絕不甘心退出這一陣地，而是頑強地反抗着的。我們如果對這種現象熟視無睹，不和它劃清界限，不

展開激烈的鬥爭，不徹底地肅清它，這將不僅毒害了年青一代的讀者，同時也將戕害了古典文學遺產和對古典文學的研究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不再談到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先生是大家熟知的古典文學的研究者，他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已經三十多年。他三十年前寫的「紅樓夢辨」、解放以後修改出版的「紅樓夢研究」，以及最近散見於各報刊的短論，尤其是作為他對紅樓夢全面的總結性的文章「紅樓夢簡論」〔一〕，是廣泛地吸引着讀者的。但是，這樣一個具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古典文學研究者，究竟走着什麼樣的道路呢？

俞平伯先生的第一部研究紅樓夢的著作「紅樓夢辨」寫於一九二二年。這部全面涉及到紅樓夢各種問題的著作，曾經是風行一時的、和胡適之的「紅樓夢考證」並稱的所謂「新紅學」的代表作。它給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其後，他所寫的文章，大都以此為根據。它的基本論點一直貫串到「紅樓夢研究」和「紅樓夢簡論」，指導着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的全部過程。因此，全面地從「紅樓夢辨」開始分析和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工作，嚴肅地評價他在思想戰綫上的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二二年前後，由於中國的政治形勢起了劇烈的變化，由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更廣泛而深入的傳播，「五四」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綫開始分裂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道揚鑣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向着兩個方向分化着。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了維護自己階級的狹隘利益，就放棄了反封建的文化鬥爭，調轉矛頭，直接對付馬克思主義，企圖阻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의 傳播和運用。

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胡適之，為了抵抗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在政治上提出了「多研究些

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三」，在學術上提出了反動的實驗主義的「考據學」。胡適之提倡「考據學」的目的非常清楚。他說：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問題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裏，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態度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攔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着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够，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可奉為定論。……」

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作一個不受人惑的人。」（胡適文選目序）

除開胡適之的歷史「著作」不談，在文學研究方面，他就是以「紅樓夢考證」等形式主義的「考據」文章實踐了這一主張的。

胡適之所提倡的學術路綫，其反動的目的就是阻撓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的傳播，把他們蒙着眼睛牽着鼻子走向「國故」堆裏去，脫離現實，避開當時尖銳的階級鬥爭。

在文學研究上，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就正是這條路綫的忠實的追隨者和實踐者。據俞平伯先生自己說，在胡適之提出這些口號之前，他對紅樓夢「還沒有系統的研究的興味」，等到胡適之的「紅樓夢考證」發表之後，「於是研究底意興方才感染到我」。這時俞平伯先生才正式開始系統地研究紅樓夢。胡適之和俞平伯曾以通信的形式討論紅樓夢，彼此一唱一和，使他們「一向希望的樂趣，到這時居然實現」。這自然是喜不自勝的事，因為「紅樓夢辨」完全實踐了他們的主張。

但是，要引導人們脫離現實，避開社會的階級鬥爭，首先就必須否認文學是人類認識生活、反映

生活的藝術手段。因為，說明現實主義文學，正是通過把社會生活現象的本質典型化的方法，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教育和改造人的靈魂，從而促進社會的改造，這就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真正使命，也是文學研究、文學批評所要闡明的中心問題。「新紅學派」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首先否認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胡適之的「紅樓夢考證」的中心目的就在於用考證來證明紅樓夢是一部記錄事實的作品，它的價值也就在於這「平淡無奇」的事實記錄上。

俞平伯先生也正是沿着這條道路前進的。「紅樓夢辨」曾分別考證書中諸情節的事實真相，認爲賈姓即曹姓，以曹雪芹的家世證實寶玉，以賈寶玉的形象證實曹雪芹的身世，並將書中個別的字句或情節拼湊起來，去斷定一個人的結局。俞平伯先生把研究和分析藝術形象的工作變成了「剔骨拔刺」，以瑣細的考證凌遲了人物形象。這樣就和胡適之的結論完全達到一致，即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作品，因而否定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的社會內容。

但是，實驗主義的「考據學」是無法掩蓋它的唯心論的尾巴的。「紅樓夢辨」在從多方面論證紅樓夢是事實的記錄時，常常陷於自相矛盾，時而說它是「自傳」，時而又說它是「演色空」觀念。既是事實，又如何演？既是「演色空」觀念，而事實又在那裏呢？這就是實驗主義「考據學」無法消除的自我矛盾的悲哀。

文學認識和反映現實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於喚醒人們去改造現實。「紅樓夢辨」在否定紅樓夢社會內容的同時，也就否定了它的社會作用；亦即它反封建的傾向性。「紅樓夢辨」在「高本與戚本的大體比較」一章中說：「依高本看，紅樓夢是文學，是喚醒癡迷，陶寫性靈的；依戚本看，紅樓夢是閒書，是爭妍取媚，噴酒下飯的。」這兩個判斷把紅樓夢的思想性完全抹煞了，無論就那一個判斷看來，紅樓夢都失去了它真實的價值，變成表現抽象「人性」的東西。於是，從「自傳的觀念」論

者的觀點看來，紅樓夢是沒有意義的作品。請聽俞平伯先生怎樣說：

「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一切中國的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類文學底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紅樓夢底態度雖有上說的三層，但總不過是身世之感，牢騷之語。即後來的懺悔了悟，以我從楔子裏推想，亦並不能脫去東方思想底窠臼；不過因為舊歡難捨，身世飄零，悔恨無從，付諸一哭，於是發而爲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的閒書性質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紅樓夢辨中卷二——二二頁）

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一書中雖將這段話刪去，但他企圖貶低紅樓夢的傾向仍然存在着。這樣就給紅樓夢注射了消毒劑，清除了它的「危險」作用，這對於封建階級是大大的有利。在這裏，俞平伯先生所以把紅樓夢看成是曹雪芹「自傳」的目的就完全暴露出來了。不僅這樣，在俞平伯先生素來的認識中，全部中國古典文學都是毫無可取的，上引的一段話中說的還較緩和，而在「紅樓夢辨」的其他地方却是十分的露骨了，「凡中國的小說，都是俳優文學，所以只知道討顧客的喜歡」，「曹雪芹所指野史大約就是金瓶梅」。同時他也不滿於水滸的「獎盜賊貶軍官」，並諷刺嘲笑儒林外史對「村老兒唱戲的，却一唱三歎而不止」。這很明顯地是反對那些作品對人民的歌頌和熱愛。對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持虛無主義的否定態度，這正是「五四」以後洋場紳士的本色。從這種反動的虛無主義的否定論出發，必然會引導到喪失民族自信心。

從以上的分析中不難看出，胡適之派的「新紅學家」們所標榜的「這種文學，看似專家的考證，其實很可給一班人以歷史觀念」的「歷史觀念」，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貨色了。

有人說俞平伯先生不是以觀點著名，而是以考證方法著名。那麼，就再看看他的考證方法的實質是什麼。

「紅樓夢辨」是專重事實的考證而避開內容不談，這正是胡適之所標榜的方法。胡適之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中說：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着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證學的方法。……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作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但我自信：這種考證的方法，……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會用過的。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二二二——二三三頁）

我們認為考證作者的家世、生平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須是在爲了分析作品內容的前提下才有意義。可是，胡適之和他的忠實的追隨者俞平伯先生因爲「考證」，却把紅樓夢豐富的社會內容抹煞了，使完整的藝術形象割裂了，剩下的只是幾條能滿足俞平伯先生「研究興味」的事實根據。

究竟「紅樓夢辨」是怎樣進行考證工作的呢？

俞平伯先生說：「我們有一個最主要的觀念，紅樓夢是作者底自傳」，「既曉得是自傳，當然書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實有而非虛構」。從這一「最主要的觀念」出發，去尋找事實的根據來證實它，這是一條最輕便的道路。從表面看這一「最主要的觀念」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作者自叙中的某些話裏得來。但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它有某些事實作藍本是不足爲奇的，然而它絕不是事實的記錄。如果相信作者自叙的話全是事實，也應該相信賈寶玉是那塊大石頭的化身，相信真得太虛幻境。如此，恐怕俞平伯先生的考證也要大費周折了。

俞平伯先生的「最主要的觀念」是片面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其實用的目的就在於從作品中抽出對他有一「興味」的事實，來證實它的假設，使客觀的作品中的藝術形象服從於他的主觀主義的考證。在文學研究的考證工作中，這是徹頭徹尾的實驗主義方法。胡適之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考證」方法，在「紅樓夢辨」或「紅樓夢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所謂「大胆的假設」就是不顧一切客觀事物的真象，製造出主觀的觀念；所謂「小心的求證」就是使所有客觀的事物都能符合這種主觀的論斷。使客觀服從主觀就是實驗主義主觀唯心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俞平

伯先生考證紅樓夢的方法論的源泉，就是從此而來。

「紅樓夢辨」雖然在表面上避開了紅樓夢的內容不談，實際上却狠狠地批評和歪曲了紅樓夢的內容，從每一個考證的結論中都可看出他對紅樓夢的曲解。俞平伯先生只不過是以考證的方法代替了文學批評的原則而已，這是和他的實驗主義觀點密切相關的。因此，在他的批評中就表現出強烈的主觀主義色彩。（關於這一點，我們在評「紅樓夢研究」一文中已有論述，此處從略。）

由此可見，俞平伯先生的方法論的基礎正是實驗主義的主觀唯心論。那些形而上學地企圖把方法和觀點對立起來的人，在這裏却大上其當了。

顧頤剛先生為「紅樓夢辨」所作的序言中把俞平伯先生和胡適之標榜為「新紅學派」，並「希望大家看着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那麼，這「新紅學」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總結起來，不過三點。

第一，「新紅學」的研究態度表面是新的，而骨子裏仍然是舊的。俞平伯先生在一九二一年說：「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為消夏神方，因每一執筆必奕奕如有神助也。」（「紅樓夢辨」顧序）避開當時的政治鬥爭，鑽到紅樓夢中去消遣，逃避現實的士大夫階級的怯懦本色完全暴露出來了。這却是真正繼承了舊紅學家最壞的傳統。

第二，「新紅學家」自稱是把「研究的方法改過來了」；「從前的人不注意於實際的材料，而注重於猜度力的敏銳，所以他們喜歡用冥想去求解釋」，而「『新紅學』家」是「處處把實際的材料做前導」，「用新方法去駕馭實際的材料」來解釋主觀的冥想。所謂「新」方法就是在新的反動的實驗主義哲學指導下鑽牛角尖的方法，這的確是舊紅學家所沒有的。歸根結底，他們是使紅樓夢符合於他們的實驗主義的考證，這正是他們引以自豪的「正確」的科學方法，也是最有「效用」的方法。

第三，「新紅學家」曾想辦一個研究紅樓夢的月刊，號召「人結了伴侶，就我們走到地方再走過去」，引導讀者逃避現實的政治鬥爭，免受馬克思主義的「危險」影響，都很安全地到紅樓夢中去「消夏」，「辨得越凶」，離現實越遠越好。用這些東西來影響讀者，使他們「無形之中，養成了他

們的歷史觀念和科學方法」，都變成實驗主義的信徒。

總之，「新紅學」的實質就在於它是士大夫階級意識和買辦思想的混血兒，是反動的實驗主義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具體表現。幾十年來成績雖不多，而影響却不小，它支配着對紅樓夢的研究，過去是這樣，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還是這樣。

但在解放以後，在新的政治條件下，俞平伯先生非但沒有對過去的研究工作和他的影響作深刻的檢討，相反的却把舊作改頭換面地重新發表出來，這就是一九五二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紅樓夢研究」刪去了舊著中個別的篇幅、細節和著作年月，並和補充的部分新作排在一起，在新的時代發表。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它是新作。新作除了提供了一些新的考證材料並將個別的字句和表面結論稍加修正之外，而骨子裏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毫無改變地保留下來。俞平伯先生以隱蔽的方式，向學術界和廣大的青年讀者公開地販賣胡適之的實驗主義，使它在中國學術界中間借屍還魂。

但是，這現象不但沒有遭到反對，反而有人對俞平伯先生的考證工作備加讚揚，這種「抑揚的話頭」不但掩飾了俞平伯先生的一切錯誤，而且幫助他的有毒的思想得以順利地向青年中傳播。從這裏，我們也更可以看到，俞平伯先生所繼承了的胡適之的反動思想的流毒，在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的環境裏，是怎樣在掙扎着的。我們不應該過低估計它對廣大讀者的危害性，它現在會將來也會披着各種各樣的外衣出現的。我們要研究紅樓夢，首先就應該批評俞平伯先生的這種錯誤的觀點和方法；要研究全部古典文學遺產就必須批判與此相同的觀點和方法——即實驗主義的反動哲學通過胡適之的過去在中國學術界所長期散佈的流毒。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我們的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走向正確的健康的道路，才能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旗幟在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領域中樹立起來，照耀着我們前進的道路。

〔一〕新建一九五四年三月號。

〔二〕魯迅全集五卷五〇頁。

〔三〕胡適文存二集卷三第九七頁。

〔四〕文中着重點全為筆者所加。

（原載「人民日報」十月二十四日）

在朝鮮的日子

馬加

——長篇小說「在祖國的東方」的一部分

長篇小說「在祖國的東方」是以鴨綠江附近的鄉村爲背景。東北解放以後，人民過着和平幸福的生活。青年共產黨員楊成林積極參加勞動，在工作中和女青年團員劉玉秀發生了愛情。當美帝國主義者侵略到鴨綠江邊，威脅了祖國的安全，中國人民爲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號召，出動了志願軍。楊成林離開了劉玉秀，參加民工隊，到了朝鮮。爲了支援志願軍，裝卸物資供應前綫。小說概括一個偉大時代的羣衆鬥爭面貌。本期刊登的一部分，是描寫民工隊到了朝鮮以後，在後勤分部黨的負責人李持平的領導下，克服了右傾保命思想，小隊長楚天標和指導員楊成林領着民工小隊，展開競賽和立功運動。顯示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熱忱，表現出英雄的行爲。

編者

三十

晚上，楚天標領着小隊出發，出了松山里，進了山溝。第五小隊也剛動身，沿着山溝甩了一個鼓肚子，長長的一溜，在楊樹枝樑下面行走。第五小隊長特別惹人注目，披着黃大衣，戴着狗皮帽子，細高挑兒里兒盪，離老遠的都能看得見。

松山里離火車站有五里地，中間隔着兩架山，一道河，一個村落。過了村前的獨木橋，就看見火

車站的票房子。票房子叫敵機炸得破頭爛齒，燒了窗戶門，剩下一個空架子。不過，票房子北邊那條街却很熱鬧，有小舖，有朝鮮冷食店，有擺地攤的小販，賣蘋果的，賣栗子的，賣花生的，賣香煙和肥皂的。在這條街上，住着朝鮮人民軍，也住着中國志願軍，志願軍是剛從前方下來休整，顯得緊張愉快。吃過了晚飯，跑到外邊打籃球，盤槓子，唱歌，拉胡琴，打刮板，吹口琴。有一隊人在做集體遊戲，圍了一個圈，要求什麼人出節目，拍着手喊叫：「再來一個！」

出來之後，小隊的民工常常散了羣，有的站在路旁看熱鬧，有的到地攤子上去買香煙。楊成林怕耽誤時間，影響了競賽，有誰想溜號，就提醒他說：

「走吧！咱們走吧！」

對面來了一個志願軍戰士，肩頭上揹着繳獲的美國卡賓槍，腦袋上包着一塊藥布，怔怔忪忪和杜莫華走了一個碰頭。杜莫華好奇的問：

「同志，你怎麼受傷的？」

志願軍戰士顯得滿不在乎，開着玩笑說：「狗咬的。」

這句話，把民工都逗笑了。

一碰到志願軍的戰士，楚天標比別人更顯得親熱，拉了拉手，又摸摸卡賓槍，鼓着眼珠子，盯得眼珠子都發癢，羨慕的說：

「同志，這是你從敵人那裏繳獲來的麼？」

「不是我繳獲來的；是敵人送禮送來的。」

戰士一邊說着笑話，一邊得意的瞟着楚天標。楚天標懂得他的意思，讚成的點點頭。
「過去自衛戰爭時候，蔣介石就給咱們運輸過武器，榴彈砲，火箭筒……」